



攻玉文丛

GONGYU WENCONG



应用语言学视角下的 中国大学英语教学研究

蔡基刚◎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本成果获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105）资助

应用语言学视角下的 中国大学英语教学研究

蔡基刚◎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应用语言学视角下的中国大学英语教学研究/蔡基刚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7

(攻玉文丛)

ISBN 978-7-309-08589-1

I 应· II 蔡· III 高等学校-英语 教学研究-中国 IV H31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5415 号

应用语言学视角下的中国大学英语教学研究

蔡基刚 著

责任编辑/唐 敏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 75 字数 304 千

2012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589-1/H·1807

定价·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倏忽间,自己成了外文学院现职教工中最年长的一个。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孝泉院长嘱我为这个丛书写篇短序,我也不好推辞了。中国人请客吃饭让长者上坐时,会说(如果用英文)seniority is beautiful,其实让与被让者全明白,那不过是虚礼浮言而已。

虽与学院具体工作脱节已久,我仍感到,复旦的外文学院至今有很强的教育机构的自我意识,我以为这是一个好传统。班级分得小,着重施基础训练于每个学生;管你什么大牌教授还是博导,都得给本科生上课,还自己动手改学生作业,对学生在学习中带共性的问题了然于胸;学外文必须讲究“精确”和“流利”并重的理念,始终扎根在我们的培养目标中。虽说这些年来物质第一主义的惊风骇浪也不免冲得有些同仁晕头转向,但基本的教学底线可以说还未被突破。我这儿就有个实例:外出做同传的教师并非单为丰酬,还主动把各种门类的知识、信息、技术、术语翻译等等的 firsthand 经验观感,带回送入课堂,或提供给编写教材或辞典的同仁做素材。怕就怕“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看人家把教育机构的自我意识丢了,反觉做“青螺”寒碜,赶着去跟风;当然,我还怕现状不改,甚至愈演愈烈,今后会怎么样,那就不好说了。

与教学相比,研究工作可能不尽如人意。别说人家怎么看我们,就连本校领导可能也认定,以“研究型”标准衡量,外文学院在文科院系中算是比较落后的单位。前几年,我读过一本威廉姆·克拉克(William Clark)所著《学术魅力和研究型大学起源》(*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rigin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的“奇书”(作者开宗明义的自我定位)。经作者梳理耶稣会教会大学、德国大学、“牛剑”

(Oxbridge)传统,算是懂了研究型大学的起源与日耳曼各国的市场因素和官本位影响有关——对此也有人质疑甚至批评——有意思的是:在浩如烟海的近 580 页的考据和研究中,作者认为,现代大学里“眼睛战胜耳朵”或“文字重于口述”(恰与老子所谓的“行不言之教”字面上相悖?);要有“学术魅力”就得依靠发表论文/著作,并邀来别人的佳评。

这套丛书多少说明,我们已经意识到复旦外文学院的相对薄弱环节,正在迎头赶上。只是我以为教师的学术研究工作,相当程度上应当以教学实践的积累为基础,又能回过头去促进教学,从而进一步造福社会。这并不排斥有的教师资质和志趣脱俗超逸,可能更适于从事纯粹的而非直接“用世”的研究工作,像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说的,“学人、科学家只代表与利益无涉的专业人格。”他们的论文是智力操练的成果,是他们“专业人格”的伸张,是乐趣的满足,发表后可望成为益智主义的佳品,用来抵拒目前正丑恶横行甚至威胁到学生的反智主义。

不过,“述”而有“作”(按朱熹解:“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即传旧同时要有所创新,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诸同仁能够各自搜辑文集,结成系列出版,肯定经过焚膏继晷的艰辛,自然要为此击节叫好。但是事情的另一面是,现代研究型大学对教师造成极大压力。压力源就是基本上以量化为准绳的职称评议制度,一种更像是中世纪西方教会和骑士团社会遗形的制度。呜呼,西方曾有柏拉图式的平等对话,中土有“吾与回(指颜回)言终日”的孔子循循善诱,都已成了教育的“失乐园”,即使今人多喜引用,实际上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看来,我们都得接受 publish or perish 的学术生态铁则。可是,学术啊,多少投机取巧的卑劣,多少不择手段的钻营,多少蝇利蜗名的刊物,多少奸究互利的委员会和辛迪加,借汝之名而行!

我常与同仁共勉:写论文,做学术,还是牢记“图难于易,为大于细”的古训为好,注重平时的勤奋积累,宁可日有寸进而不搞“大跃进”,疑他人所不疑,不以魁士定见为当然,给神话去魅,甚至质疑“常识”——总之,借用一个英语文评界的新词 problematizing——如此生存

在学术圈里,可能被晒迂腐,不懂“性价比”,但就当事个人而论,是不是学术会变得更生动活泼些?

虽说“文字重于口述”,研究型大学并不仅仅等于写出论文发表。提高一点要求说,还要培育师生的思辨口才。对教师的最低要求固然是要意尽于言,不能做大肚小口的“热水瓶”,各种课内外的研讨班(seminars)和口头陈述(oral presentations)也不能只是做做样子,多的是“单向交通”,各说各的;即使有认真听别人陈述的,大多也是谦冲自守,鲜见有人站出来质疑,更没有即时的交锋。想来,这与古希腊修辞重讨论(discourse)和演说(public address)以及古罗马的七艺(头上三种便是修辞、语法、逻辑)造成西方思辨口才传统有关,而中国修辞讲究的赋、比、兴和对仗、排比、平仄等等,非虑计再三,始能滞后表达。既然研究型大学是“舶来品”,真要培养与这样的大学匹配的人才,辩理遽生于电光火石的瞬间,辩才如舌粲莲花的训练,似也不可或缺。让我们先从提高 seminars 和 presentations 的质量做起,如何?

最后,也想对于不希望自己陷入昏庸的学界权力人物说几句:希望你们好好 problematize“成果”二字,细察目前一级又一级名号繁多的项目,戳破气泡,拧干水分,排斥上述威廉姆·克拉克描述中世纪大学特点时用的 nepotism(相当于今日所说的“关系”)。更想问一句,外文院系教师发表的译作(特别是其中有影响者,如当年杨必的《名利场》)以及长篇书评,何以不能算作成果?你们学过历史吗?当代中国学界的两次启蒙大转型,“五四”也好,改革开放也罢,大量的学术成果哪一次没有译作和书评的一席之地!惯以斤斤计较他人论文数量为业的专家,要不你们也来译一种,写一篇?

陆谷孙

2011年10月

自序

我个人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是对比语言学,尤其是英汉对比研究,应用到外语教学方面就是英语写作和英汉翻译。2002年,教育部发起新一轮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时,我被聘为新一届教育部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接着又在2006年换届后的最新一届教指委会中被聘为副主任委员。因此,在这场几乎长达10年的教改中,我积极工作,全力以赴。由于参与制定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等重要改革文件,由于要对教育部的外语教学改革政策的理解和贯彻,由于本身又处于外语教学和改革的第一线,因此就有了从不同角度观察问题的机会,有了对改革中的现象和问题的思考。于是很自然地,这些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就变成了文章和论文。从2002年到2011年这10年间,我写下了40多篇发表在外语核心期刊上的外语教学方面的文章。

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因为我可以思索,可以思辩,可以寻求答案。尽管文章中有不少谬误和偏激之处,但这是进行思辩和寻求答案不可或缺的。我喜欢对问题进行思考,喜欢说出自己的看法,喜欢不同观点的交锋,喜欢学术上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文章频频引发争议,有个别刊物直接拒绝我的稿件,说他们不愿惹是生非。我完全可以理解,外语教学不像其他学科。外语教学中的政府因素多,尤其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是政府主导和推动的,又和各校政绩和各方面利益紧密相关。不过我知道,如果在观点上躲躲闪闪,在非学术方面不断平衡,我的思想就会窒息,我也写不出有点新意的东西。一个人如果不敢对问题进行无私的、真实的思考,长此以往就会丧失思辩的能力,甚至思想的能力,那也就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甚至谈不上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而生活。小孩子为什么好奇心和创新性远远超过成人,因为他们无私,没有想得那么多。我的文章往往由于观点太直太露太激,由于

直率地说出“皇帝没穿衣服”,或说了“这个人将来一定要死”的真话,因此不时得到一顿“痛打”。按朋友的说法,自己把自己发展的道路弄窄了,甚至堵死了。但我没有后悔,我要说我精神上很快乐,因为我说了我想说的话。

我从自己已发表的论文中筛选了 27 篇编成这个集子,涉及了外语政策、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测试评估、教材开发等方面。目的之一就是让读者通过这些文章比较全面地了解这 10 年来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历程,尤其是其中的各种观点、理念和思想的碰撞,为研究中国外语教学尤其是大学英语教学的人留下一份较为真实的记录。另一目的,也是对自己 10 年来参与、学习和研究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心路历程作一个总结。

感谢各外语核心期刊主编们在他们有限的版面上刊登了我的观点;感谢复旦大学的学术氛围培养了我独立和真实思辩的能力;感谢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提供有限的资金资助我出版;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一直以来对我的厚爱和支持。

蔡基刚

2011 年 11 月 30 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外语政策研究	1
当前大学英语教学面临的压力.....	1
外语能力培养与我国外语政策.....	7
转型时期的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特征和对策研究	15
大学英语教学要求的统一性与个性化	27
制约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方向转移的因素分析	39
后大学英语教改依据与对策研究	51
关于我国大学英语教学重新定位的思考	69
全球化背景下外语教学工具与素质之争的意义	74
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目标设定研究	86
香港高校大学英语课程设置审视下的内地大学 英语教学目标研究	98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目标定位再研究.....	112
第二部分 课程、教材、测试开发	126
压缩大学基础英语,提高语言学习效率	126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衔接性和前瞻性.....	137
试论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149
大学英语教学若干问题思考.....	159
从统一性和规范性到个性化和多元化课程.....	173
后大学英语教学时代的精读课程走向研究.....	180
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大学英语教学定位研究.....	197
传统大学英语教材编写理念的一次新突破.....	210
制约我国大学英语词汇要求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对策.....	223
CET 的重新定位研究.....	237

第三部分 ESP/EAP 教学	252
ESP 与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发展方向	252
ELE 还是 ESP,再论我国大学英语的发展方向	261
中国台湾地区大学 ESP 教学对大陆大学英语 教学改革的启示	272
学术英语还是专业英语	282
全英语教学可行性研究	291
CBI 理论框架下的分科英语研究	305
参考文献	314

第一部分 外语政策研究

当前大学英语教学面临的压力*

一、社会英语热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压力

我国 2001 年加入 WTO,融入全球化经济,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在中国社会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各行各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愈益迫切,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英语水平要求也越来越高,仅“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还不够,还要求有较强的口语和写作能力,能直接和外国人交流,能用英语完成采访、谈判等任务。许多企业都把能说英语、会写英语当作很重要的招聘人才的条件。

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要使大部分大学毕业生具有这样的英语交际能力,任务还相当艰巨。根据上一届大学外语指导委员会的一项调查,发现“用人单位对近几年来毕业的大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普遍感到不满意,对口语及写作能力则更为不满。例如,他们认为口语能力强或非常强的仅为 5%,差的或极差的为 37%,能胜任或基本胜任参加国际会议讨论的仅为 7%;能胜任或基本胜任参加对外业务谈判的仅为 14%”(邵永真 1998:2)。这个调查和大学英语口语考试结果基本相符。大学英语口语考试从 1999 年 1 月到 2001 年 5 月开考 6 次,考生累计 32 107 人,获得 A 成绩的只有 7.1%,获得 B(即能用英语就熟悉的题材进行口头交际,虽有些困难,但不影响交际)以上的考生是 50.7%(四、六级考试委员会 2001)。两者相加也只有 18 550 人。如按照每次 200 万四、六级考试考生来算,其百分比极小,可见大学生英语口语交际能

* 原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 年第 3 期。

力很差。

大学生最直接感觉到入世的压力。由于基础阶段之后我国绝大部分高校都限于师资力量不足,难以开出面向大多数学生的说写应用技能课(刘长江 1996),大学生们把眼光转向了社会,结果社会外语培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这可从外语培训点上最热门的课程得到证明。例如,在上海,《中高级口译证书》课程最为抢手,这门测试考生听力、阅读、口译、笔译和口语综合能力的考试证书被上海 60% 的三资企业立为招聘中高级人才的必备证书之一。仅 2001 年就有 18 354 人参加考试,是过去 6 年考生总和(49 040)的 38% (《新民晚报》2001/12/16)。

这种英语热对我们的大学英语教学也是一种挑战。应该看到,大学英语有正常的教学体系和教学规律,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才可能发展交际能力,我们不能拔苗助长。而且,大学英语教学的对象是非英语专业学生,要求所有大学毕业生都有较强的交际能力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承认社会的要求,他们不管你的课程设置如何,不管你按照什么样的要求教学生英语,他们要的是结果,要的是能够适应他们需要的能力。因此,对入世后社会的要求,我们不能置之不理,而要有所作为,使教学体制更合理,真正“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大纲》1999:1)。

二、中小学英语教学改革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压力

2001 年中小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发展势头令人惊叹。越来越多的地区的英语课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开设,上海从 2002 年起,小学英语课开设从原来的三年级提前至一年级(《文汇报》2000/11/24)。最近上海市教委在发布《进一步加强上海市中小学外语教学实施意见》文件中提出,初中生阅读量至少为 30 万单词,高中生阅读量累计 60 万单词以上。高中毕业生掌握词汇量 5 000 个,优秀者争取达到 6 000—7 000 个,初中毕业生至少掌握 3 000 个,小学毕业生至少掌握 1 000 个(《家庭教育时报》2001/12/17)。

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最近已经颁布了《国家基础教育英语课程

标准(3—12 年级)》,规定今后高中毕业生要达到 8 级水平。而 8 级的英语词汇要达到“3 000 个单词和 400—500 个习惯用语或固定搭配”。而在听说读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如在听的方面“能基本听懂广播电视英语新闻的主题或大意”;在说的方面“能报告实验和调查研究的过程和结果,能经过准备就一般话题作 3 分钟演讲,在日常人际交往中有效地使用语言进行表达,发表意见”;在读的方面“除教材外,课外阅读量累计达到 36 万词”。写的方面“能写出连贯且结构完整的短文,叙述事情或表达观点和态度,文体规范,语句通顺”。这个标准接近大学英语四级要求。

教育基础发达的地区,尤其是重点大学首先感受到了这种压力,英语水平较高的新生抱怨说,现在的课程设置要么硬让他们在低水平的课程里重复,要么尽快让他们考过四级就不管了。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大学里,上大学英语课逃课的学生越来越多,“内容重复引起的学习自满、懈怠、学习兴趣的下降、动力的不足”(戴炜栋 2001)是这些大学的普遍情况。清华大学从 2001 年秋季学期实行了改革,打破了基础阶段与应用提高阶段的界限,不仅为新生开设了大学英语基础课程,同时还开设了写作、翻译、口语等应用能力的课程,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广东省教育厅规定,从 2001 年入学的重点院校学生起,毕业时“能基本熟练地运用英语进行口头和书面表达:在英语词汇方面,低年级要求掌握 6 000—8 000,高年级要求掌握 8 000—10 000 左右的词汇”。他们的改革正引起人们的注意。

现在已经到了规划和协调大、中、小学英语教学的时候了。外语专家和教育部多次提出“一条龙”改革,做到衔接有序,合理分工,提高语言学习效率。大学英语界在自问:我们是否准备好了迎接中小学英语教学改革的第一波冲击?

三、双语教学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压力

教育部最近颁发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专门辟出第 8 条“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教学”来阐述双语教学的重要性,并明确要求:“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

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对高新技术领域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专业,以及为适应我国加入 WTO 后需要的金融、法律等专业,更要先行一步,力争三年内,外语教学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 5%—10%。”

许多大学积极迎接挑战,研究和准备用英语教专业课。清华大学的 1 440 门课程中,已有 54 门课(包括作业和考试)全用英语授课。500 门左右的核心课程将采用国外名牌高校的名牌教材作为教学参考书(《中华读书报》2001/12/05,2001/12/19)。清华、北大等多所国内名牌大学都在调查国外著名高校使用的教材。北大有 30 多门课程、中山大学有 8 门课程采用原版教材。复旦大学引进了哈佛大学全套课程的 7 600 多种教材。重庆大学的双语教学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广东省教育厅明确提出要“将英语确定为部分课程的教学语言,并逐步使其成为与普通话地位相同的教学语言”。

双语教学似乎与大学英语教学关系不很大,但是有两个问题引起我们思考:

1. 按照《大纲》精神,专业英语也即双语教学应在第五至第七学期开设,但现在不少学校在第一学年就开始了双语教学。我们应该如何协调大学英语与专业英语的关系?

2. 双语教学的关键是师资。广东省要求高校目前 35 岁以下的非英语专业的青年教师通过自学、培训、进修攻读学位来提高英语水平,在 2005 年以前能用英语进行部分专业课授课,到 2010 年基本达到全用英语授课。那么大学英语是否要承担起培训的任务?重庆大学已经开始了对其他专业教师的英语培训。而许多院系也把眼光瞄准了大学英语教师,让大学英语教师到自己的专业来读学位,一可以解决学位低的问题,二可让他们来上一点英语专业课。但问题是,一旦他们读出了学位,往往提出调到他们拿学位的系去,这对本来已经很紧张的大学外语教师更是雪上加霜。

四、学分制改革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压力

“入世”后,大学与国际接轨的最大动作是推出全面学分制改革,

有三个重要内容:1)压缩总学分;2)推行选修制;3)实行弹性学制。这三方面改革无不对目前的大学英语课程设置造成很大的压力。第一,根据清华大学刘西拉教授对大学生进行的一项调查,感到学习负担“比较重”和“很重”的学生共占66%,认为在大学苦读几年后,“能学到一点点”和“根本学不到”有用东西的学生占79%,认为课程设置合理的只有8%(《中华读书报》2001/12/05)。学分制改革就是要通过合理设置课程,压缩总学分,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学效率。目前我国大学的本科总学分一般在150到180学分。要减轻学生负担,把学分压缩到现在国际上通行的140学分左右,大学外语这一块不能不作出相应的调整,因为大学英语教学同样存在刘西拉教授调查的情况。而根据《大纲》,学生一定要完成4个学期280个学时的大学英语学习,也就是说要占到16学分。要压缩,就不能是4个学期,或不是每周4个学时。如复旦大学原来是16学分,现在要求压缩到14学分。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是12学分。清华大学更低,只有8学分。学分压缩了,学时减少了,如何完成大学英语基础阶段的学习?如何做到要加强学生的交际能力,要“4年不断线”?其次,学分制是把学分与学费挂钩,按学分收取学费,这样花钱就有权选择学生喜欢的课程,学校则应提供足够的各种大学英语课程。而且目前绝大多数大学前两个学年的大学英语课只有三四门,都是基础课程,没有发展学生应用能力的口语、写作、翻译等课程。学分制实行的是弹性学制,学生可以在3到6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完成本科学习,这就要求大学英语教学能提供让他们用较短的时间学完大学英语课程的体制模式。

学分制改革引发的不只是课程设置,还有教材编写,以及整个教学理念。

五、扩招给大学英语教学带来的压力

通过过去3年的扩招,全国高校在校3个年级人数平均增加了80%以上。大学英语师资紧张的状况日趋严重。中山大学是45个英语教师教1万名学生。扩招带来的压力不仅是师资,还有教室、计算机使用等。例如复旦大学2001年就由于教室不够,把3个班级压缩为两

个。有的大学从缩短基础阶段 4 个学期的大学英语上找出路:学生读了一个学期就让去考四级,通过就放掉。有的从网络 and 多媒体上动脑筋:一半甚至全部的课时让学生在光盘上自学,老师只是答疑。这对教学质量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教育部提出把 2001 年我国大学生 1 100 万的规模发展到 2005 年 1 600 万的世界第一的规模,大学英语教学做好了没有?

六、网络技术给大学英语教学带来的压力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运用和英语网络资源的开发使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受到了挑战。现在的学习环境与十年前甚至五年前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学习外语的手段比以前大大丰富了。市场上大量的有声资料 and 多媒体软件,每种教材不仅配有光盘,而且有参考辅导书籍。这使得学生对教师的依赖性越来越少,对传统的教学模式形成挑战。根据上海交通大学的调查,83% 的学生喜欢通过听广播、录音和看电视英语节目来学习英语。“学生已趋向于摒弃仅仅靠教材来学英语的模式,转而采取从多种媒介和渠道接受输入。”(郑树棠 1996)越来越多的实验也表明,多媒体教学在输出形象化、学习个性化、安排科学化等方面都优于传统的教学模式。正因为如此,教育部 2001[4]号文件规定,重点大学“所开设的必修课程,使用多媒体授课的课时比例应达到 30% 以上,其他高等学校应达到 15% 以上”。

引进或借助多媒体教学的优点已成共识,问题是多媒体能不能部分替代教师?如果行的话,又如何替代,替代的比例是多少?如何处理人机关系?这些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论辩。有的看重教师的人格魅力和教书育人的任务;有的强调多媒体教学的效率。在多媒体教学形式上也有多种模式。有的是把学生集中到大教室看多媒体演示,教师同时讲解;有的是让学生通过看光盘自主学习,然后或在网上就难点咨询教师,或再到教室接受教师检查和辅导;有的是一个教师在主教室上课,同步传到二十几个分教室,并可向他们提问;有的引进多媒体教学后还是每周 4 学时,不减少时间;有的是采取 1:3(多媒体 1,教师 3)甚至是 2:2。在课堂上,教师基本上不对课文和语言点进行详细的讲解分析,

除了花一定时间来检查学生掌握课文和掌握词语、语法结构的熟悉程度外,更多是开展以培养学生交际能力为中心的各种活动,如:教师列出和课文相关的参考书目或文章,让学生自己去读,然后写出读书报告,或做 Presentation,在课堂上交流。再如:组织各种口语交际活动,围绕课文主题展开讨论和辩论,运用课文中的词语、结构进行各种交际性质的游戏。

总之,教学模式的转变是我们不能回避的。

外语能力培养与我国外语政策*

一、引言

2002 年和 2003 年是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年。教育部正在启动新一轮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如制定《大学英语教学基本要求》),给大学英语教学重新定位等。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张尧学(2002:8)指出:“转变思想,把由培养学生阅读能力为重点转变到提高学生综合性实用能力上来。……我们必须把听力和交流放在英语教学的重要位置,并全面发展和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这一说法作为官方提出是第一次,应当说是对现行《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的直接挑战。

改革开放后,我国先后产生了两个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即 1986《大纲》和 1999《大纲》。前者实际分成理工科和文理科两个大纲,但都明确规定“大学英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一定的听(和译——理工科大綱)的能力、初步的写和说的能力,使学生能以英语为工具,获取专业所需要的信息,并为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打下较好的基础”。后者的修订工作从 1996 年开始。同年 5 月,大学外语教学

* 原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 年第 5 期。